

2017 年台灣人文學社年會

「台灣文化檔案熱」

徵稿啟事

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一股以台灣庶民生活為主題的影像產品潮流，或者以再現台灣地景、風俗民情與社會問題的紀錄片和影像藝術創作，介入文化保存、弱勢族群、生態環保、歷史記憶、甚至轉型正義等議題。我們要探究的是，這眾多的影像檔案如何從現實、藝術風格、社會關懷與批判等面向瞭解台灣？或者「台灣」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商業符碼？台灣的檔案化使得台灣的真實變得不可能？影像檔案如何能獲不能發揮社會與文化改樣的動能？

從理論的觀點來看，每一階段的技術的演化不僅是影像、資訊與檔案複製與持有能力的突破，更必然對於人的身體、知覺、大腦神經系統、記憶與時間意識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我們從技術性的角度觀察閱聽人或感知主體如何進入「分心狀態」(distraction)，反思人類的生命痕跡如何不斷透過外部化(exteriorization) 開展出延異(difference)的過程；這些都涉及影像、記憶、時間意識的政治與倫理問題。我們只能被迫不斷消費資本主義體系餵食給我們的資訊和影像，檔案熱的症狀是否可能或必須醫治，是否還有可能談反抗、救贖或正義我們要探討的核心議題。

另外，檔案必然涉及檔案化。所謂檔案化除了指涉建檔系統的確立之外，更意指決定何事何物值得被登錄記載為檔案的選擇，亦即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中何者可說，因此反映了建檔者眼中腦中之現實。閱聽檔案的行為亦是檔案化的一環，使用者解讀檔案的方式及解讀的過程賦予檔案朝未來延伸的向度。此外，紀錄、整理、儲存與傳播等技術的變遷對建檔過程甚而所謂可建檔材料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希望從不同的文本出發，檢視紀錄原則、閱聽過程與技術演化等因素如何交互作用，形塑各種不同的檔案化過程與檔案形式，並帶出各種關於歷史記憶、身體感官與生命模式的政治與倫理議題。

我們歡迎針對特定台灣影像(電影、紀錄片、藝術展演、小說與非小說)文本或單純理論探討的發表，參考子題如下：

文化生產與再生產

影像、歷史記憶與真實

台灣主體性

台灣的建構與解構

商品化與文化純真性

全球化與在地性

技術性(technicity)、感知與時間意識

檔案化與檔案形式

有意發表者請在 8 月 15 日前將題目、簡單摘要(250 字左右)與聯絡方式寄至：

twhsociety@gmail.com，信件主旨請註明「投稿台灣人文學社 2017 年年會」，經籌備委員會審查與討論之後，將於 8 月 31 通知結果。年會預定於 12 月 2 日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舉行。

2017 年台灣人文學社年會

籌備委員會（依姓氏筆畫排列）

李鴻瓊（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林宛瑄（元培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副教授）

涂銘宏（淡江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黃涵榆（召集人，台灣人文學社理事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蔣伯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助理教授）

鄭如玉（台灣人文學社秘書長，佛光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助理

黃乙辰（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碩士生）

2017 年台灣人文學社年會

「台灣文化檔案熱」

時間：2017 年 12 月 2 日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八樓視聽會議室

主辦：台灣人文學社

合辦：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議程

9:20~9:40	報到
9:40~9:50	開幕致詞 黃涵榆（台灣人文學社理事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9:50~11:30	場次一：檔案化與檔案形式 主持人：黃涵榆（台灣人文學社理事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與談人：林建光（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楊乃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題目： 科技、檔案與新鄉土影像
	發表人：廖勇超（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題目： 秘密、檔案、怪物性：談德古拉中的隱現邏輯
	發表人：林宛瑄（元培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副教授） 題目： 「七夜怪談」系列中的鬼檔案
	午餐 台灣人文學社會員大會
	場次二：技術性、感知與時間意識 主持人：楊乃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與談人：李鴻瓊（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p>發表人：王念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博士）</p> <p>題目： 克拉考爾與班雅明的「分心美學政治」</p> <hr/> <p>發表人：李蕙君（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p> <p>講題： 傳導的關懷論述</p>
14:10~14:20	休息
14:20~16:00	<p>場次三：檔案台灣</p> <p>主持人：李育霖（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p> <p>與談人：涂銘宏（淡江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p> <hr/> <p>發表人：高嘉勵（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p> <p>講題： 記憶與情感的角力：解讀日治自然檔案的困難和可能</p> <hr/> <p>發表人：楊宗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博士候選人）</p> <p>講題： 《郵票中的臺灣主體性研究》</p> <hr/> <p>發表人：梁廷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碩士班）</p> <p>講題： 無可理喻的檔案：論「靈遊書」與「靈異影像」的檔案法</p>
16:00~16:10	休息
16:10~17:10	<p>綜合討論</p> <p>主持人： 吳介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副教授）</p> <p>討論人： 蔡士瑋（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兼任助理教授、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哲學博士）</p> <p>蔣伯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助理教授）</p>
17:10~17:15	閉幕

註：各場次論文發表每人 20 分鐘，評論 15 分鐘；綜合討論引言每人 20 分鐘。

如何「看見」台灣？檔案、技術、新鄉土影像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楊乃女

2017 年 6 月齊柏林在花蓮進行《看見台灣 II》空拍作業時，直升機不幸墜機，齊導演罹難之後，重新點燃大家對他作品的關心。他的紀錄片取名為《看見台灣》，顧名思義，即是以影像紀錄台灣，而齊柏林的作品引起討論熱潮，在於他的紀錄片主軸採取特殊的攝影方式，也就是空拍。由於齊柏林個人對攝影美學的執著，這部紀錄片大部分的內容十分唯美，他本人也因為從空中長期觀察台灣的地景，發覺台灣的地貌逐漸因為污染而變樣，因此，這部影片便結合環境議題，而成為一部唯美的影像與環境議題結合的紀錄片。也因為這部影片訴諸影像帶來的情感力量，招致許多學者的批評，例如郭力昕認為此片以溫情主義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對於造成環境污染的社會結構問題並無實質上的幫助（2014：121）。

無獨有偶，邱貴芬教授於 2016 年出版了研究台灣紀錄片的專書，書名也用了「看見台灣」這一詞。邱教授關心的是紀錄片裡「看到了那些觀看台灣的角度和方式？」以及「我們又該如何看見影片未看見的台灣？」，這兩個問題與齊柏林的紀錄片一起看待，格外有意義。從學者對《看見台灣》的批判，以及邱教授對紀錄片長期觀察而提出的觀點，我們可以思考下列幾個問題：紀錄片做為一種影像檔案，究竟要如何留下何種記憶與歷史？齊柏林運用空拍的技術拍攝紀錄片是否為紀錄片帶來新的美學表現？如果是的話，這個新的美學如何與政治產生關係？技術是否會影響美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呢？

齊柏林《看見台灣》使用了紀錄片比較少見的手法，亦即空拍的技術，導演的初衷為拍攝美麗的台灣，然而空拍的技術提供了他一個特殊的機器之眼的觀點，讓他得以看到平常肉眼的距離看不到的全貌，再加上長時間的觀察，讓他可以看見地貌的轉變，因此讓他從美的關懷延伸至對環境議題的關切，所以這部紀錄片常常被歸類為環境議題紀錄片。即使導演本人有此關懷，筆者認為以此分類來批評導演去政治化並且將嚴肅的議題流於情感的訴求，其實忽略了導演的最初的企圖為攝影之美，其實這部影片是技術、美學與政治互相摺疊最佳例證。《看見台灣》的影像檔案建立在有距離的高度所產生的視覺效果，這些影像的魅力來自視覺的穿透力。當後現代思潮試圖要解構距離、深度等概念時，齊柏林非常獨特的以距離作為其觀看的新角度，但是這個距離是一個技術、視覺與地景產生新關係的方式，他利用空拍的機器之眼所創造的影像是 Timothy Morton 所說的 hyperobject，同時這個 hyperobject 牽動了政治關懷。白先勇曾描述楊富閔鄉土小說為「新鄉土小說」，

筆者借用「新鄉土」一詞來形容齊柏林的《看見台灣》，這部紀錄片藉由技術的輔助呈現了新鄉土影像，而這個新鄉土影像讓我們得以檢視美學與政治之間新的連結。

關鍵字：《看見台灣》、檔案、美學、政治、技術、新鄉土影像

怪物檔案《德古拉》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廖勇超

當代對於檔案的討論多環繞在檔案化過程所產生的透視性、知識產製、及其所支撐的意識型態和權力：檔案化所仰賴的客體化以及客觀性所指向的不僅僅是資訊蒐集、分類、和秩序建立，更重要的是該過程中對於檔案內容所產生的掌控與配置。就如同德希達所言，檔案一詞本身具備開始(commencement)與命令(commandment)兩種意涵，而這所意味的即是檔案化必須取決於某種空間的劃定以及對於該空間內資訊的透明掌握(檔案內絕不能存有異質性、秘密、或是彼此不相關的雜訊)。這也就是說，即使檔案本身可以是秘密(所謂的「秘密檔案」)，檔案中卻不能有秘密。然而我們可以追問的是，若檔案化是一種資料篩選建立的理性過程，本身意在去除不相干事物以及防止秘密產生的話，難道在此過程中沒有雜質灰塵般的破碎資訊亂入？在檔案化的全面掌控資訊的企圖之下，會不會有所謂的「裏檔案」、秘密資訊隱藏在檔案此一空間地域的陰暗皺摺之處，使得檔案並非如一般想像的透明清澈，而是秘密橫陳、妖氣流竄？本文擬從上述問題意識出發，分析愛爾蘭小說家史托克(Bram Stoker)經典吸血鬼小說《德古拉》(*Dracula*)中的怪物檔案性。《德古拉》此一小說的特殊之處，便在於其徹頭徹尾的檔案性質：《德古拉》全文由不同檔案化技術(如速記、柯達照相機、留聲機、打字機、電報、剪報、航海日誌等等)所紀錄下來的資料集結而成，本身即是一個檔案。而小說的主角們更是無時無刻不在紀錄、檔案化其所面對的各式怪物資訊，本身皆可以被視為是具備檔案家的身分。然而弔詭的是，這原先意欲馴服超自然迷信現象並將之除魔化的意圖卻在整個檔案化過程中陷入泥淖，使得整個文本/檔案充滿了各式的秘密和怪物性，不僅不清楚通透，反而晦暗不明、處處充斥著迷向空間、超自然現象、非主流情欲、以及吸血鬼怪物。本文將以主角強納森哈克(Jonathan Harker)進入德古拉城堡的例子為出發，進一步闡述其「進入德古拉城堡」做為一種西方理性檔案化失效的範例，並從中開發德古拉城堡作為一種「怪物檔案」的可能性。

關鍵字：《德古拉》、檔案、秘密、怪物性

《七夜怪談》系列中的鬼檔案

元培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副教授

林宛瑄

《七夜怪談》於一九八八年在日本上映後，帶動J-horror風潮，除了其後在日本上映的幾部續集或延伸電影之外，韓國與好萊塢也分別推出改編版本，好萊塢甚至在距《七夜怪談》首映十七年後的二零一六年再度推出最新續集《七夜怪譚》，足見本片迴響之深遠。評論者多從媒體焦慮以及日美文化差異的角度切入探討本片及其開展的系譜，本論文亦思從日美版本營造恐怖感的差異切入，然更欲強調的是，片中的詛咒錄影帶如何可能是一種鬼檔案，及詛咒錄影帶如何突顯檔案作為一種非人事件的層面。在此事件中，觀者臣服於鬼檔案陌生難解的影像(或說銘刻痕跡)，人形/世所賴以成立的知覺慣習、歷史經驗與意義體系被迫重整，朝向怪物般不可知的未來開放；而片中女鬼採取VHS式家庭錄影帶做為檔案化形式以及相應的檔案化過程，更突顯人如何涉入其中並成為一種鬼檔案的銘刻痕跡，以回應檔案重複再銘刻並持續傳遞的暴烈呼求。

本論文第一部分將聚焦於《七夜怪談》以及好萊塢版本的第一部《七夜怪談西洋篇》，處理日美版本中不同的恐怖感來源，並探討其間差異如何形塑詛咒錄影帶的影像邏輯，因而形成兩種性質略異的鬼檔案。兩個版本皆設定女主角得職業是記者，聽聞流傳於青少年之間「看了詛咒錄影帶後會接到電話告知妳七天後會死」的都市傳說之後展開調查。日版的淺川玲子與美版的Rachel在調查過程中都研究了報社存檔等各種檔案資料，兩人的調查因而可說是一種檔案研究，詛咒錄影帶則形同某種秘密檔案，兩人皆希望透過解讀這份檔案解開貞子/Samara的身世之謎，並在過程中重構歷史。然而美版將小女鬼的恐怖感置於家庭秘密的框架內，精神科醫師的介入以及紀錄談話治療過程的影帶更強化了Samara案例作為精神分析檔案的意味，但也不免透露出人類社會單位的歪斜促使恐怖誕生的訊息。兩相對比，日版電影中日本御靈信仰傳統與現代科技想像的結合，則更強調詛咒錄影帶的非人力量作用機制。

本論文第二部分則將援引傅柯、德希達與貝倫(Jaimie Baron)等人對檔案概念的討論，進一步主張詛咒錄影帶如何體現檔案的暴烈面，在人們試圖從中發掘被壓抑的知識時，被檔案朝向未來開放的鬼魅性攫住；七日時效突顯的是，檔案閱聽者必得以身心涉入閱聽過程，也必須在遭逢鬼檔案的非人邏輯時有所回應。誠如傅柯所說，檔案是統理特定歷史時期的陳述得以在何種條件下於甚麼範圍內顯現的體系，換言之是決定此特定時期所可說者為何的法則，因此檔案研究涉及發掘陳述的條件與界限，涉及從銘刻痕跡中尋找被

特定權力機制壓抑的線索，重塑歷史意義。德希達則在探討檔案在政治權力與法律上的效應的同時，也提出「檔案熱」的概念，指出建檔執念與遺忘焦慮之間的張力，並強調遺忘焦慮導致反覆衝動成為檔案朝向未來開放的動能，檔案刻痕因而總指向某個無法相遇的他者。本論文主張《七夜怪談》系列電影提出的問題之一正是，如果檔案研究以發掘另類陳述條件的可能性為目的，在發掘到完全超越人類社會秩序的非人感知與邏輯時，人如何向之臣服以重整自身，如何如實回應其指向的鬼魅未來。貝倫對視聽檔案的探討則有助於我們思考，詛咒錄影帶作為一種視聽檔案，如何運用 VHS 錄製技術的特色，將所謂歷史轉化為檔案閱聽者浸潤其/期間的非人體驗，並迫使閱聽者進一步成為一種檔案刻痕。

關鍵字：《七夜怪談》、鬼檔案、檔案刻痕、鬼魅未來、非人力量

迎向分心的美好時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博士

王念英

克拉考爾 (Siegfried Kracauer) 與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在二十世紀初提出分心 (distraction) 探討複製科技引發的感知革命，關注新媒體、現代性與大眾文化的相互影響。兩人樂觀地看待現代社會的新興視聽媒體如電影、廣播、留聲機帶來的感知衝擊，試圖發掘大眾美學革命的政治潛能。當同時期的理論家對於媒體大量複製傳播的文化產物感到憂心，貶抑其為讓群眾暫時抽離現實的淺薄娛樂，兩人卻認為製造分心的大眾媒體潛力無窮，不但揭露資本主義的生產消費模式，更可動搖極權體制規訓理性進步的中心思想。兩人先後嘗試理論化分心美學政治，特別是克拉考爾開闢分心理論的疆土，相信新興媒體帶來的感知變革，能重新賦予大眾動能，超越傳統藝術觀念的專心框架，以散漫對抗專制政權的集體動員與監控。本文提出分心理論運用於聲音研究的潛力，並延伸至多重媒介實踐的可能。

由此延伸，西方傳統知識論中仰賴視覺作為崇尚理性思維的專注典範基礎，而轉向聽覺層次則提供超越此一既定知識框架的可能。科拉瑞 (Jonathan Crary) 的《感知的懸置：專心、景觀與現代文化》(*Suspension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從傅柯的歷史系譜觀點出發，認為專心規訓的理性思考是現代化過程中各種生產機制對主體的支配力。從十九世紀開始建立的觀察體制所形成的權力關係，產生新的主體，是觀察者，也是消費者，是構成現代化過程的一份子，參與各種權力機制如傳播、生產、消費理性效率的操作模式，衍生出新的專心規訓。由此更清楚視覺傳統下形成無所不在的觀察主體，主導我們對物質現實的理解，不可避免成為詮釋中心的機制。歸納上述，分心可以是一種科技媒介啟動的美學感知力，超越視覺主導的電影經驗，感受聲音帶來的觸動賦予重塑世界觀的可能。本文認為將分心理論延伸到運用到多媒介的音像辯證，在今日快速變化的數位科技時代，引領我們回溯感知系譜，開啓媒體研究的檔案大門，是有待探索發展的美學理論。

關鍵字：分心感知、聲音研究、大眾文化

傳導的關懷論述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李蕙君

宋澤萊在《廢墟台灣》描述因媒體的氾濫而過度使用眼睛的現象。攝影師心想：「常人的眼睛可以使用一百年，而我們在四十年把它用完，是一種『過度使用』的原則」(49)。當人體無法負荷與界面的互動時，就如小說中的角色小惠的感覺。當被問起對未來的打算時，她的回答是：「我想停電！停電你懂嗎」(49)？停電是一個歸零的狀態，當所有網絡的載體已失去能量，權力的互動也停息。但在零之後，是「一」的開始。此處的 0/1，如電子設備的開 / 關。停電是否就切斷網路，即能關掉資本主義的餵食系統，重新分配注意力？另一方面，小說提到媒體作為監視人民的機器：「超越自由黨在憲法上增了一個條款，就是課以百姓每天有收看電視一小時的義務，電視機上有錄影裝置，可以錄進觀賞電視者的表情，人員定期檢查錄影記錄，以評價百姓的「忠誠度」」(51)。在互聯網的時代，並不是人看電視，而是人被電視看。大量的觀看數據將成為瞭解或控制人民的依據。人民要如何在數位社會中安身立命？數據如何成為人類的集體文化記憶？作為後人類記憶的延伸，存放在物件的第三記憶被挪用成為大數據，在保護安全和控制人民、編輯和保存記憶、預測未來和刺激消費中傳導互動。本文將探索網絡控制論和第三記憶間的交互作用，主張關懷的論述——結合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關懷(care)的概念、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對於傳導關係(transductive relation)之想法以及思辨技術(speculative *techné*)的概念——將打開程式封閉性並增加第三記憶在工業化程式書寫裡的動能。

人機之間的傳導關係

相較於動物，人類可將記憶存放在物件上。斯蒂格勒稱此記憶為第三記憶(tertiary memory)，認為第三次記憶是人類進化的重要元素(4)。西蒙東進一步探討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具有傳導性。他強調人與資訊網絡之間相輔相成的特性。換句話說，如果人「停電」了，機器以及整個資訊與經濟網絡也將停擺。另一方面，哈克曼(David Heckman)提到：「人類和機器之間的交互作用(在程式設計水準上，在使用水準上，或者在子程式層面上越來越多)，演算法(algorithm)成為人類語言和機器語言之間的中介。因此，人類經驗可被機器讀取，這成為一個強大的顛覆目標」(479)。當人類記憶可大量存於機器上，而機器又能閱讀、分析、記錄、操弄人類語言時，檔案化的過程與技術更顯複雜。若演算法成為檔案化的機制，檔案化的過程將會

是如何進行？機器可以讀取人類經驗，人類能否閱讀機器語言，反轉知識結構？

第三記憶與程式碼

在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的帶動之下，資本主義的強度更加劇。斯蒂格勒提到工業化的程式書寫造成短時間迴圈。他認為程式設計工業(programming industry)造成全球注意力短缺(global attention deficit) (2010: 179)，並且必須經由教育注入程式設計工業，以反轉許多人滿不在乎的態度(I don't give a damnism)。¹ 斯蒂格勒進而提出長期的視點(long-termism)，但在速度掛帥的資本文化裡真有可能實現嗎？如果可能，要如何去執行？他提到，教育可培養長時間迴圈，由腦突觸(synaptogenesis)改變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他的理論的不足是，對於技術層面著墨不多。程式碼(code)的技術性可經由軟體研究的理論補足。本文舉出檔案的社交環境及程式碼書寫的技術面，以提供新的討論面向。

演算法可說是人工智慧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與機器學習的文法，而程式碼就像是文字。何姆斯(Steve Holmes)提到，程式碼是一非人的能動者，而非有意識的大他者(除非是人類想像中完美的人工智慧)。²¹² 如何在人與機器的互動之下，發展出最佳的演化進程？人工智慧在乎的是時效、準時率、「最」佳化，經由機器學習，運算出「最」大利益的決定。建檔者將如何建置對國家最「優」的典藏文化檔案庫呢？

若要檢視檔案的演變及記錄過程，釐清檔案的定義，可增進對建檔的瞭解。哈潑等人(Richard Harper et al)在〈什麼是檔案？〉(“What is a File?”)一文提到，檔案的社交環境比檔案本身的內容更為重要，因為檔案可被存在許多地方，舉凡本機硬碟、雲端、與社交平台。而檔案的社交環境，可以從它被放在資料庫上或者社交平台上來檢視。舉例來說，根據研究，在臉書上對照片的評論和按讚，比照片本身內容的價值還要重要，許多使用者將這些數位文本列印下來，貼到牆上(8)。因此，雖然使用者仍可將這些資訊存成一個檔案，但如此一來便切斷了原始檔案與社交環境的關係以及效力(8)。檔案的社交環境帶來的啟示是，在撰寫演算法時，必需考量檔案域外的價值。傳統上被邊緣化或刪去的內容，反而是最具價值的部分。

¹ “As consumers generally, we are becoming systematically unconscious, mocking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behaviors while living in a structural I-don't-give-a-damn-ism that completely privileges the short term and systematically penalizes the long term” (2010: 43).

² “...code is a nonhuman actor and not a conscious human Other(excepting perhaps the dream of perfect AI)” (Holmes).

除了對檔案更進一步的定義以外，建檔的過程也間接涉及到程式碼。蓋洛威(Alexander Galloway)提到硬體自身無法寫入(writing)內容，必須經由程式碼(軟體)才能寫入，使硬體運作(165)。³ 也就是說，使用者在操作硬體時，雖然看不到軟體背後的程式碼，但卻是程式碼賦與硬體生命。程式碼是硬體及編寫程式的靈魂。建檔技術除了必須考量其社會環境之外，編碼與其隱蔽性也是建檔過程的關鍵。全喜卿(Wendy Chun)提到：以商業和專利為主的意圖，將程式設計(programming) 這個動詞變成名詞「程式」(program)，將動態的創造變成固化的意義(4)。當資本主義邏輯擴張至各個面向，甚致滲入建檔的過程時，第三記憶的質量就可能被量化並凍結文化的動能。若閱聽者能閱讀程式碼，將在使用檔案時得到更深一層的內容。而並非所有程式碼皆能被存取，因此，將毒藥反轉為解藥的方法之一，則是鼓勵開放原始碼與培養閱讀電子書寫的能力。

關鍵字：傳導，關懷，程式設計，程式碼，軟體。

徵引文獻

宋澤萊(2013)。《廢墟台灣》。台北：前衛。

Chun, Wendy (2011). *Programmed Visions: Software and Memory*. Cambridge: MIT

P. 4.

Galloway, Alexander (2004).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IT

P. 165.

Heckman, Davin (2014). "Subversion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Digital Media*. Eds., Ryan, Marie-Laure, Lori Emerson, and Benjamin J. Roberts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478-81.

Holmes, Steve (2016). "'Can We Name the Tools?': Ontologies of Code, Speculative Techné and Rhetorical Concealment." *Computational Culture* 5: n. pag.

Stiegler, Bernard (1998). *Technics and Time I: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New York: Stanford UP.

---(2010). *Taking Care of Youth and the Generations*. Trans.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New York: Stanford UP.

³ "Code draws a line between what is material and what is active, in essence saying that writing (hardware) cannot do anything, but must be transformed into code (software) to be effective" (Galloway 165).

記憶與情感的角力：解讀日治自然檔案的困難和可能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高嘉勵

由於台灣獨特的後殖民情境（以抗日史觀取代殖民史觀），解讀任何殖民時期的檔案一直難逃政治的角力，解讀台灣自然相關的檔案當然也不例外。戰後長期缺乏對殖民的論述，即使解嚴後，也因人事已非且語言隔閡，日治檔案彷彿陷入「瞎子摸象」的情境。本論文嘗試以《台灣歲時記》對熱帶「四季」的清代和日本文獻整理、片岡巖《臺灣風俗誌》對具在地代表性的動植物的介紹、《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以中國古典建構台灣自然史、《榕樹之蔭》的台灣各地旅遊介紹和郵戳呈現等資料，從「日治以前」、「日治時期」和「解嚴後」三個不同的時間節點，以及（西方）帝國、殖民母國（日）、殖民地（台）、侵略目標／文化傳承（中）的地域歷史，思考這樣的時間和空間關係，對在地自然衍生的歷史記憶與情感所產生的可能影響。

關鍵字：日治時期、台灣自然、檔案、情感、記憶

郵票中的臺灣主體性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博士候選人

楊宗樺

郵票是由國家單位發行，不僅代表國家主權的意識形態，也代表國家的門面與自我定位，就如布魯（Stanley D. Brunn）所言，郵票是國家的產物，代表一個國家對內與對外的「窗口」，這個窗口闡明該國應如何地被看待（315）。郵票是國家向內或對外傳遞的媒介之一，其設計與所呈現出來的意象也代表一國的自我形象與認同，由於是由國家發行，也可以視為是官方的歷史檔案，背後隱含的國族意識形態值得分析與探討。本文研究臺灣的意象是如何在郵票史中出現、呈現、與再現其主體性，探討當中的政治意涵與國家認同取向的轉變，且追溯郵票史上，臺灣與中華民國兩者間是如何在歷史縫合的過程裡產生身份的斷裂。並進一步思考，在主體的建構過程中，是否因為這種身份的斷裂，更加確立臺灣的主體性，抑或重構與解構了想像中的臺灣共同體，而更加暴露出臺灣主體性的曖昧不明。

雖然中華民國郵票已擁有超過百年的歷史，但是相關研究的學術論文卻不多，其中探討關於郵票史上的臺灣主體性議題，更是幾乎闕如，因此引發本文研究的動機。根據本文作者的研究，相關主題研究的最為詳盡的是狄斯（Phil Deans）的文章（“Isolation, Identity and Taiwanese Stamps as Vehicles for Regime Legitimation”），狄斯在此文中，以 1949 年至 2004 年在臺灣所發行的郵票為分析對象，探討其中所呈現的臺灣認同與政權的轉移。至今，臺灣已經出現了第三次政黨輪替，隨著本土化的呼聲，與新世代的出現，尤其是在太陽花學運之後，臺灣主體性與認同更加確立，而郵票中流露出的意識形態也隨著時代的潮流趨勢而變化。本文將接續並擴大狄斯的研究範圍，涵蓋的年代從 1895 年至 2016 年（以在臺灣所發行的郵票為主），且聚焦於臺灣主體性在郵票中的呈現。

本文分成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回顧相關文獻，指出（臺灣）主體性的定義與重要論述。臺灣主體性的意義具有歧異性，且在談及「主體性」時，常伴隨著「認同」（identity）的議題，這兩個詞彙常交替使用，但是有些學者（如：Donald E. Hall）則是區分這兩個詞彙。在臺灣主體性的論述部份，則側重於廖朝陽所提出的「空白主體」的說法。第二部份指出十九與二十世紀郵票中關於臺灣主體性開始出現的幾個轉捩點，這期間雖然具有臺灣意象的郵票開始出現，但是在郵票中的臺灣意象多是以自然景觀的方式來呈現，這種手法即是視「臺灣」為一個地方、一個地理名詞，而不具文化意涵或政治意義。第三部份援引威尼須庫（Thongchai Winichakul）所提出的「地理－身體」（geo-body）一詞的概念來分析二十一世紀在臺灣出版的郵票裡是如何呈現國家的身體、與再現臺灣的國家定位，並

試論與空白主體論述間的呼應有無。在結論中則思考，在郵票中所呈現的臺灣意象，是更加確立臺灣的主體性，或顯示出臺灣主體性的不足。

關鍵字：臺灣、郵票、主體性、認同、空白主體、地理－身體

無可理喻的檔案：論「靈遊書」與「靈異影像」的檔案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碩士生

梁廷毓

現有大部分關於檔案的研究文獻中，可以發現，大多偏重於重新看待檔案與當前現實的關係，以及細緻的挖掘檔案中的各項細節，進行再研究、再闡述。或是因為殖民的歷史中，掌權者透過檔案來支配與管理，並進行掌權者的歷史書寫，所以在今日大部分處理歷史與檔案的研究中，大多都在處理歷史敘事與檔案的關係，並且聚焦在如何去解構權力的問題，以及去揭露背後的權力系統如何運作；不然即是透過田野的方式，從民間的口述中找尋材料，對大歷史進行再辯證與再補充。但卻鮮少進行檔案概念本身的辯證。

因此，本文主要圍繞在對於理性思維的檔案方法之排他性，以及另類檔案的探討。一方面重新挖掘 90 年代靈遊書的所蘊含的檔案性質，對其資料庫般的地方鬼故事、與對於敘事空間的佈署進行探討，另一方面嘗試將靈異照片置於影像史的脈絡下進行文件性辯證，重探以上兩者與當前社會所認知的檔案之間的關係為何，背後涉及了何種特殊的現代性質變，並重新檢視檔案與管理、分類的概念做為西方的產物，如何可能在當代的台灣形成了另類的處理歷史敘事的觀念。

雖然可以理解的是，每一門學科都是一套封閉而完整的真相系統，所以在處理靈異影像與鬼故事時，總是和條理分明的知識系統是如此格格不入。但是，靈異影像與靈遊書的鬼故事，始終是盤旋在檔案與歷史之上的幽靈，仍然是懸而未決、或被視而不見。我認為唯有去開始談這些複雜、仍然不明確東西，重新去討論這些被各種探討檔案的學術文獻所丟失掉的東西，我們才有可能開始去思考在當代究竟需要何種處理檔案的觀念與歷史觀，也才能開始思考我們需要的是何種歷史書寫。而這些內涵著某種檔案特質的「類檔案」、「類敘事」、「類書寫」在當代的認知難題本身，也許是處理歷史經驗的複雜性，逃脫理性中心之意識形態鬥爭的可能路徑。

文末，藉由上述二者的性質，進一步思索當今檔案的認知邊界何在？並試圖提出「靈性檔案」與其「檔案觀」的可能思維及樣態。

關鍵字：鬼故事、靈遊書、靈異影像、檔案

Note

Note